

从沿海 到边区 的 考察

费孝通著



特邀编辑 张智楚
韩光亚
责任编辑 陆宗寅
封面装帧 孙宝堂

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

费孝通 著

沿海经济杂志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沿海经济杂志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61,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208-01036-6/F·199

定价5.05元

目 录

长江三角洲之行(代序)	(1)
一个不寻常的信息	
——从农民买汽车看发展农村运输业的重要性	(16)
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	(20)
推动乡镇企业继续前进	(26)
港行漫笔	(31)
温州行	(48)
淮阴行	(66)
盐滩行	(76)
海南岛民族地区开发问题漫谈	(83)
临夏行	(98)
镇长们的苦恼	(110)
农业发展的新台阶	(116)
海东行	(129)
话说呼伦贝尔森林	(136)
全国一盘棋	
——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	(148)

南岭行·····	(157)
四年思路回顾·····	(165)
《四年思路回顾》后记·····	(199)

附录:

从“江村经济”到小城镇研究

——费孝通教授七访江村随行记·· 张行端 谷 炎(203)

忘不了广西的兄弟民族

——访费孝通副委员长····· 张智楚 卢仲云(209)

费孝通教授与乡镇企业·····张智楚(214)

长江三角洲之行

(代 序)

今年人大开会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到江苏、浙江两省的代表，受到他们的启发，并结合我这几年在长江三角洲的调查研究，对这地区进一步开发问题进行了一番思考，接着同民盟的同志们展开了讨论，形成了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写成了建议，提交中共中央参考。这是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关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第三个方案。

两年多以前，民盟提出的第一个方案是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建议，中心内容是要把甘肃、青海两省和宁夏、内蒙两个自治区沿黄河上游两岸的地区，利用该地丰富的水电和矿产资源，建成一个我国西部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除供应日益增长的国家需要外，留下部分资源来发展地方和乡镇企业，以达到改变这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民盟为此在两省两区间牵线搭桥，取得共识。最后作出书面意见，很快得到中央的采纳，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民盟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是关于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设想。这建议是今年3月份送中共中央的。不久山东省东营市来人找我们商量具体的开发方案。原来，中共中央已经把这个建议转到山东省委，东营受命着手具体规划，在胜利油田开发后

期如何利用地面资源，发展后备企业。以保证这个地区一旦石油枯竭经济仍能继续繁荣。

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初步设想是民盟提出的第三个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如何利用这地区的有利条件，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建立一个能带动长江流域腹地的经济开发区。这个开发区将通过长江和陇海铁路这两条大动脉把长江三角洲和西部原材料基地及三线所蕴藏的科技力量相沟通，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形成一条横贯大陆的经济脊梁，迎接21世纪新时代的到来。

这份建议交出后，我原本打算去一趟江苏南通，为已由张智楚同志编就的《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补加一篇《南通行》。行程已定，临行前接到江泽民同志的通知，要我和民盟负责同志去见他。大家一起促膝谈心，讨论有关长江三角洲的开发问题。谈话结果，我们表示民盟愿为这个设想承担红娘的角色，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把这个设想带到地方上去进行意向性的探讨，以使各方能易于取得共识。于是我们改变了原定行程，4月初开始了包括南京、杭州、上海的长江三角洲之行。

—

开发长江三角洲的设想是在国际新形势的背景下提出的。当前我们可以说正处于世界旧格局开始瓦解而新格局尚未形成的转型关口。在这时刻，我们要有点紧迫感和预见性。只有清楚了世纪交替中的复杂形势，才能站稳脚跟，以新的姿态，迎接21世纪的来临。

从现在已经比较清楚的形势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雅尔塔会议为先导所形成的“两霸格

局”正在解体，而从东欧动荡中马耳他会议为开始的“四强格局”已露端倪。两霸指的是美苏，四强指的是美苏欧日。在这个交替中出现的是两降两升的趋向。四强格局能否持久很难说。新升的两强尚未定型。以欧洲共同体说，德意志统一后将起什么变化猜测很多。西边这一强可能一分为二。东边的日本在经济上已经强大了，但是成为一个大国条件尚未齐备，而且更重要的，东方还有潜力巨大的中国和印度。他们在今后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谁也不敢轻视。四强格局过渡到群雄格局大有可能。

和我们直接有关的是在这个未定之局中所存在的机遇，利用这机遇可以恢复我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有过的地位，进入现代世界上的先进行列。

要达到这个目标，得看看现在的条件。从经济和科技水平来说，我们和当前的先进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是落后了。这点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已打下了向这目标奋进的基础。首先是我们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已经有40年了。近10年来的改革开放又把我们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航道拨正了。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都已经比70年代翻了一番。发展固然是不平衡的，但是应当看到走在前面的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有一部分实现了“翻两番”。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再有10年，绝大部分地区达到小康水平是完全能实现的。

再说过去10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进展，主要有赖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有赖于国内外局势的稳定。总的看来，在今后的10年也不致有大的变化。有了稳定的局面，就能继续进行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在今后10年中还有比过去10年更好的条件，那就是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祖国。《香港基本法》的制定说明一国两制的构想是现实可行的。海峡两岸统一的局势也正朝着有利的方向推进。最近台湾当局已有所松动，台资上陆也出现了新的势头。8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这个小小的岛屿来说，究竟是不容易消化的。台商在各地找出路，找来找去，还是回老家为上策。说到底，原是同根生，谁不愿意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事实胜于表态，我在昆山访问时，市长就从饭桌上被拉出去接电话，一位台湾商人要在他们的开发区买25亩地，准备办工厂，急于要市长拍板。在杭州还听说黄龙饭店三四月以来天天客满，其中有90%是台胞，有时甚至连大厅都挤满了。假以时日，海峡两岸总是要统一的，说不定就是在这10年里。

中国像个大鼎，台、港、澳的归还就有了三只脚。鼎有三足就站得稳。这样，广大腹地就可以在鼎腔里翻番。作为鼎口的沿海地区进一步开放也就更具有利条件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些了，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确实给了我们难得的机遇，只要我们政策对头，事情办好，不仅可以早日争取祖国的统一，而且可以争取更多的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腹地的繁荣，增强国力，问鼎世界。良机莫失，事在人为。

二

这些年，我从沿海到边区对小城镇进行了一些考察，每年东西穿梭，获得一个较深的印象是：每当腹地的经济健康发展的时候，对外开放的要求就迫切了；而每当沿海地区顺利开放的时候，又会要求腹地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了。如果广大腹地真是翻两番，仅靠香港一个转口商埠显然是不行的。最近，邓

小平同志提出再建几个香港，开始还弄不大懂他讲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清楚一点了。如果再来看看香港的发展和现状，就更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再建几个香港。

香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楼房林立，宛如混凝土大石林；车水马龙，国际往来频繁，真是财大气粗，派头十足。现在大陆60%的输出要靠它转口。大量利润几乎让它独占，离了它还不行。其实，香港能有今天，还不是吃了大陆的“封闭”饭一下子肥了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香港比上海差得多，没有多少人想去。我那时出国路过香港，它还不像个样子。城市破破烂烂，临海的几条街道到处是鱼腥味。人们穿着木屐来来往往，嘈杂之声闹得行人掩耳侧目。直到60年代初香港仍不如上海。但是在后来的10年至15年里却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主要是搞转口贸易、金融流通以及种种投机倒把的地产生意。再后才办起了一些小工厂。到了“文革”期间，大陆去了不少人，办了许多小企业，给香港带来很大好处。但是香港地盘小，劳力有限，毕竟不是办工厂的地方。近五六年来，在大陆开放的政策下，他们把工厂扩散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搞“三来一补”取得了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赚了不少利润。香港把它的工业扩散了，但是贸易、金融、信息和运输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却牢牢把住在自己的手里，因此发了大财。

前几年提出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在一定地区和一段时间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成功的经验。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1亿人口、资源又丰富的国家，我以为这不是最佳的模式。在当今讲究实力的世界，作为一个大国，首先要有自己的原材料、能源基地，然后要有轻重工业和贸易、金融、运输等配套机制。时至今日，我们应当站得高一点，为做成一个大国迈步了。

我觉得现在事情比较好办一点，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家已经注意到原材料、能源、交通的发展。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已经进入实质性行动阶段，那块狭长地带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材料、能源供应地。这样，沿海地区的开发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发展外向型经济就多一层保障。中国的东部和西部要配合衔接，同步发展，两部都可以有一些地方先富起来，带动后进，全面繁荣。我把这种格局叫做“全国一盘棋”。

开发应该包含发展和开放双层意思。现在西部开发区已经初步兴建，那么东部选择一个港口，建立一个大陆的香港已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中国这只鼎起码在香港归还前要有一个与之成犄角之势的进出口商埠。

三

当然，这个新的进出口商埠的选择可以是多方位的。但是，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未来21世纪看，我认为重建东方大港——上海是比较现实的，也可以说是最佳选择。其实，我不过是老话重提。孙中山先生早在1914年所著的《建国方略》中在设计建国宏图时，就提出过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中山先生是很有眼光的，当时他已看中了长江三角洲这块宝地。

上海的优势有地理的因素，但主要是历史造成的。当年十里洋场的上海，堪称东亚第二，仅次于东京。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有168家银行，58家外国银行在上海设立了分行。有一条很气派的银行街，早就是亚洲的金融中心。那时，各种商品的进口量占全国的50%至80%，是中国最大的外贸中心。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由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工业发展很快，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近几年每年要给国家上交200亿的利润。上海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但

是，解放后，中国被西方国家封锁了，后来自己又关上大门，上海的外贸地位没有恢复。沉重的负担使上海自身的城市建设都无力跟上去。这几十年来，上海确实是陈旧了。但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并没基本改变。要在大陆上再建一个香港，实在非上海莫属。重开东方大港也是恢复上海青春面貌的有效措施。

我在江苏考察时，国务院宣告正式批准开发浦东区。到了上海，正遇上市人大会召开。于是会内会外，上上下下的热门话题自然就是开发浦东了。大家都挺高兴，也有几分激动，都觉得这是国家扩大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推动上海发展的一股强劲力量，而且必然也会推动长江沿岸各城市的经济发展。

那么，我们所设想的开发长江三角洲与浦东开发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显然，两者原是一回事，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彼此衔接，相互补充。其实，从全局来看，问题的关键不完全在这种关系方面。而在于浦东开发后，上海究竟是建成深圳式的上海，还是香港式的上海？这是两个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我以为，上海不能走深圳的路子。这是因为上海的地位本来就与深圳大不相同，再说现在腹地的经济状况与80年代初期也大不相同了。如果上海浦东仍象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换言之，上海应在经济上成为江浙及沿江城市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那么，上海就将是一个具有广大腹地的“香港”。

从世界各国来看，进出口商埠都具有优良的港口或便捷的

交通。上海处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清代康熙年间就设立海关，鸦片战争后即辟为通商口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沿海岸线，上海居中，北有连云港、南通港，南有温州港、宁波港，沿长江西进，有张家港、镇江港、南京港。现在，沿海、沿江的这些港口却苦乐不均，忙闲不一。有的吞吐量不足，经常吃不饱，有的却常年压港，上海港的码头几乎周转不过来。如果将这些河海港口统一规划，分层开发，形成网络，分工协作，对外开放，组成以上海为龙头的港口群，上海就可以利用自己在贸易、金融、信息、科技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组织货源，合理安排流向，及时调度调节，各个港口的作用就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得到更大发展。这个经济布局远胜于香港。

拥有上海的长江三角洲，原是农业发达的鱼米之乡，是盛产粮食和畜产品的宝地。而且又联得上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广大腹地。就这方面来看，上海有条件通过内河航运和铁路公路运输，成为全国性的对外贸易中心。20世纪30年代，中国60%的茶叶和猪鬃就是从上海出口的。

说到这里，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的内涵已经逐步明确起来。我还想强调一点，这个开发区内将存在分与统的双层结构。基层是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包括国营、集体、个体、独资、合资、合作等所有制，是多元化结构；上层可以是上海与江浙合作并和国家配合形成高层次的贸易、金融、运输、科技服务中心体系。只有强化这个地方和国家的服务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全结构的统一协调。不难看出，这种双层结构既体现了开发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总格局，又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

四

这次南行，我还有个打算，其实也与开发长江三角洲有

关。我想到基层去看看那里的乡镇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达到什么水平，也想听听基层干部群众对开发长江三角洲的真实想法。这件事情主要是在对江苏由村到镇，由县到市的考察中完成的。从中我获得许多信息，长了不少见识，思路因此也拓展开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基层干部和群众也象江、浙、沪的领导一样，对扩大开放的要求十分迫切。他们都觉得我们原先在关于长江三角洲开发的设想中提到以“八五”作准备，纳入“九五”规划的建议未免太迟缓了，普遍希望提前实施，应纳入“八五”计划。二是江浙两省各级干部和有关人士对浦东的开发感到震惊，有喜有忧。如果中央只给浦东优惠条件，则会给江浙会带来一些不利；如果浦东能与江浙同步开发，则能使中国这块心脏地区很快富裕起来。实际上上海与江浙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因此，普遍希望中央能把长江三角洲作为整体来考虑进行，深化改革，并给予有利于扩大开放的政策。这种对改革开放的紧迫要求实在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和内在需求。

这次我重点调查了苏州地区的情况，再次去昆山自费开发区和吴江的同里、松陵、盛泽等镇，第14次回访开弦弓村。苏州市长告诉我，苏州早已不是上海的后花园了，而是开放的前沿。从1985年中央将苏州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后，工业总产值一直紧跟在沪、京、津三大城市之后，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四位，尤其是外向型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对外贸易平均每年递增41%。利用外资项目达447项，实际利用外资近两亿美元。对外经济合作已发展到承包工程、劳务输出、技术服务、创办海外企业等多个领域。1989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403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280元。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指标，苏州实际已

进入工业化的中期了。因此，跻身国际市场，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调整和重组苏州工业比以前更显得迫切了。

前几年，我就知道他们自己出资，兴办了几个自费开发区。我还为昆山自费开发区呼吁过。这次我再去昆山参观时，这里的高架管道已环绕开发区周围，广阔公路平坦畅通，厂房盖得适用漂亮，环境优美，很像个样子了。据称，从1985年以来，开发区累计完成工业产值15亿元，所获利税是投入基础设施费用的2.3倍。1989年完成的工业产值与全国14个沿海开发区相比，仅次于广州和上海闵行，居第三位。现在开发区内有美国、日本、南朝鲜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开办的10多家联营厂。这些厂还带动了全市36个乡镇村办的工厂，仅加工费一项一年就可收入5000多万元。听来，这里正在成为一块对外开放的“熟地”，开始发挥其对外吸引、对内辐射的作用了。

苏州城西的那块自费开发区，我没有来得及去看。据介绍那里的道路骨架已形成，水、电、气、通信也已修通，还建造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各种建筑。苏州的同志说，我们与上海的联系要比与南京的联系密切。有的产品龙头在上海，龙尾在苏州；也有的产品龙头在苏州，龙尾却在上海。两家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亲密得很。如果上海通过浦东开发，能够更上一层楼，成为东方大港，苏州则愿意成为对外开放的第三个层次——沿海经济开放小区的“试验田”。上边可以先利用这里已经耕耘的“熟地”，给予适当优惠条件而先得益，以便与浦东衔接起来。

后来，我对“熟地”这个概念更清楚了。江浙两省那些靠上海较近，工业基础较雄厚，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快，交通又方便，科技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都想跻身于国际市场，吸收更多的外资和更先进的技术。现在似乎已到了“万事齐备，只欠

东风”的时刻了。

越深入到这些“熟地”的县村，这种感受就越深。这次在我家乡吴江县的几个镇和开弦弓村看了看，情况比我想的要好些。我原以为进入商品经济不久的农村，头一次遇到产业结构调整，会不会受到冲击而影响农民的收入。没有想到，这里的干部群众，经受了这次考验，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指导思想更明确了。

正如吴江县委书记所说的，搞现代化不能割断历史，而要继承传统，利用优势。在调整前，我们的提法是吃饭靠农业，用钱靠副业，建设靠工业。调整政策下来后，我们的提法变为：稳定靠农业，致富靠副业，发展靠工业，技改靠外贸。

我了解到现在吴江全县已经做到农、工、副三业良性循环，协调发展。实行种植、养殖、加工、出口相结合，逐步形成五条龙：从栽桑养蚕到缫丝织绸、印染整理再到服装加工一条龙；养兔产毛到加工兔毛纱和兔毛衫一条龙；种植席草到加工凉席、榻榻米一条龙；养猪、养羊到加工皮革制品一条龙；蔬菜种植、加工一条龙。与此相对应，还成立了五个农工贸相结合的企业集团和创汇集团。外贸收入在全省已经维持了8年第一，去年外贸收购额达6.8亿元，其中乡镇企业3.7亿元。全县还办了25个合资企业，引进外资2400万美元。今年农民的收入不但没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吴江县县长听了我讲的开发长江三角洲的设想后，很风趣地说，吴江与上海官方没有多少来往，乡镇企业与上海民间倒是难舍难分。有的已经私订终身，~~配得叠到证件，二明证正婚。~~有的小企业还神气得很，上海的国货公司欠他们面债，有一家高达几千万元。当然，我们还是~~巴望着上海~~名办些“洋行”，阔绰起来，和他们攀亲也沾光，~~将来搞个信息、周转资金也方~~

便多了。

五

苏州的经济能达到今天的水平是不容易的。为搞外向型经济上上下下都吃了不少苦头。就说引进外资、开办合资企业吧，大多是听说有回家探亲的外商，抓住机会闯门拜访、说好话，然后再通过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牵线搭桥。这样搞法很像我幼年时见到走街串巷的“货郎担”，讲交情、撞运气，甚至还会上当、受骗、受气。

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有自己的信息总汇，各种信息，投资来源都应及时集中和扩散。这种机构过去上海称“洋行”或商行，它要既能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又能综合比较作出正确判断与决策。当然，不是说现在一步就能跨上这个台阶，而是有一个过程的。江浙两省的同志提出，可以先从“货郎担”上升到“赶庙会”阶段，大家有个地方坐下来洽谈洽谈。每年春秋两季的广交会，就是两次这样的大庙会。这里的经理、厂长们一次不漏地往南边跑，既羡慕又不解。他们说，从经济实力、科技文化水平、地理交通条件去看，长江三角洲不比珠江三角洲差，有的地方还强，为什么不能办一个“上交会”呢？

近几年，商品经济发展很快，横向联合越来越多。一些有识之士，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组织起上海经济协作区，还成立了专门机构，做了大量极有用的工作。可是江浙与上海之间，始终捏不到一起，有时象亲家，有时又成了冤家。谁都不让谁，谁也不服谁。显然，仍是地方本位思想在作怪。要穷大家一起穷，要富大家一起富，那种“齐步走”、“一刀切”的平均主义只能彼此牵制、互相羁绊。结果，三家共同治理太

湖的事没办好，“蚕茧大战”、“兔毛大战”、“珍珠大战”绵延不断。

这次考察又听到了一个新问题。苏、锡、常、通，杭、嘉、湖一带与上海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方面越来越趋同了。丝绸、化纤纺织、化工、家用电器、电子仪器、机械加工等工业都出现了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引进或重复建设。这种趋同性，一方面说明长江三角洲的工业基础越来越强了，是件好事情。另一方面却表明市场越挤越小了，大家只好竞相减价，出现肥水外流的现象。

江浙沪的负责同志都看到这一点，并意识到照此下去有导致经济萎缩的危险。大家想到一起了，共同提出开“上交会”的要求。上海打算通过“上交会”引进高技术，在调整中使产业、产品结构更上一层楼，开辟新市场。江浙也希望更上一层楼，依靠上海新一轮的辐射和协调发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我想，这样一来，三家的关系就容易在利益均享，风险共担，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理顺。开发长江三角洲也就有了共同的基础。

说实在的，江浙沪三家，各家都有自家的利益。我也听到了三家还同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就是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问题。长江三角洲这块“风水宝地”，是我国上交财政最多的地方，近几年按“包干”规定，二省一市每年上交利润一共大约二百三四十亿。上交的比例也不小，都在60—70%左右。对于这一点，三家都很识大体，顾大局，通情达理。大家认为自己应该多为国家作贡献，并希望每年保证在不减少上交财政的前提下，中央能给一些政策，如超额利润提成的办法，以便施肥培土，增强地方实力，为开发长江三角洲积累资金。否则，“吃饭财政”难以为继了。

这里不仅涉及到财政体制的改革，还涉及金融体制的改